

「隋煬帝三記」敷衍故實手法析論： 兼論其撰作時代

趙修霈*

摘 要

「隋煬帝三記」的撰作時代迄今未有定論，主張「唐人說」或「宋人說」者，各有其立場。本文通過三篇隋煬帝傳奇之內容，尋繹其敷衍故實的傳奇手法：〈海山記〉通過講述隋煬帝故事，暗藏深刻之歷史批判（「以述代論」）；〈開河記〉不依據隋煬帝史事書寫，利用其他相關故實層層孳衍，創作出連環扣合、密織成網的隋煬帝故事（「歷史衍異」）；〈迷樓記〉藉由敷衍隋煬帝故實，呈現史傳簡略評議的隋煬帝形象（「設詞指事」）。再進一步地，由內容結構、歷史觀點、寫作手法來看，「隋煬帝三記」應屬北宋傳奇，且以〈海山記〉時間最早，至遲應在哲宗元祐間，〈迷樓記〉稍晚於〈海山記〉，最遲作於徽宗時，〈開河記〉最晚，約在南宋高宗初期。「隋煬帝三記」應先後撰作於北宋哲宗初期至南宋高宗初期的四十年間。

關鍵詞：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隋煬帝、傳奇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nalyzing the Technique of Elaborating Existing Anecdotes in *Three Stories of the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and Determining Its Time of Creation

Chao Hsiu-Pay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Scholar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when *Three Stories of the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was written. Moreover, it still has some arguments to claim that the work was written in the Tang or Song Dynast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tents of the three stories, and to interpret their writing techniques, specifically elaborating existing anecdotes, a typical technique of legend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tent structure, historical viewpoint, and writing technique, *Three Stories*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work of legend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i Shan Ji* (Sea and Mountain Records) was first completed, and *Mi Lou Ji* (Story of Labyrinth tower) was completed slightly later than the *Hai Shan Ji*; *Kai He Ji* (Record of opening the Canal) was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the last one written. Although the specific creation time of the *Three Stories* varied, they were written over a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40 year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 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Gao Z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Hai Shan Ji*, *Kai He Ji*, *Mi Lou Ji*,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The legend

「隋煬帝三記」敷衍故實手法析論： 兼論其撰作時代

趙修霈

一、前言

關於隋煬帝故事的研究，曾有學者歸納為三個面向：一是隋煬帝故事文本的作者與成書時代、過程，二是個別隋煬帝故事的內容及文學特質研究，三是多篇隋煬帝故事的比較研究。¹而「隋煬帝三記」²過去的研究成果亦與以上三面向大致相合，且大多著眼於撰作時代上，主要有兩種觀點：宋人說與唐人說。

主張宋人說者，有魯迅、寧稼雨³、蕭相愷、薛洪勳、郭紹林、程毅中、章培恆、駱玉明等；魯迅、寧稼雨、薛洪勳、章培恆、駱玉明認為「隋煬帝三記」內容、文辭均愈來愈通俗⁴，且〈海山記〉見於北宋《青瑣高議》⁵；蕭相愷以為「隋煬帝三

¹ 劉莉：〈古代文學領域中隋煬帝故事研究綜述〉，《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5（2012.10），頁 105-108。

² 「隋煬帝三記」包括了〈隋煬帝海山記〉（以下簡稱〈海山記〉）、〈隋煬帝開河記〉（以下簡稱〈開河記〉）、〈隋煬帝迷樓記〉（以下簡稱〈迷樓記〉）。

³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 143-144。依《四庫提要》「三記」作者題署韓偓，實「出偽托」，故列「三記」為宋人作品。

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頁 77-78。比較〈海山記〉三篇與〈大業拾遺記〉，前者與後者「相類」，但「敘述加強，顧時雜俚語，文采遜矣」。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引《四庫提要》，說〈開河記〉「詞尤鄙俚，皆近於委巷之傳奇」；又說〈海山記〉「敘事精簡，文筆平淡」。頁 143-144。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 156-157。看法與魯迅相近，將〈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列為宋人歷史傳奇，其內容與文辭均愈來愈通俗，甚至懷疑「其中有些素材也可能來自說話的『講史』」。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中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327-328。二者認為〈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是北宋傳奇俗化最早的代表。

⁵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將〈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收入〈宋之志怪及傳奇文〉，《唐宋傳奇集》亦列「三記」於宋代傳奇，主要原因應為〈海山記〉見於北宋《青瑣高議》，「自是北宋人作，

記」是在「明顯地影射著北宋後期的現實，小說中的隋煬帝與宋徽宗，有著十分驚人的相似之處」⁶；郭紹林、章培恒特別舉文字內容為證⁷，程毅中也就寫作手法來看，認為〈海山記〉「比較近於樂史的史傳小說，寫作方法也像是宋人」，並進一步認為〈迷樓記〉、〈開河記〉「有可能是《青瑣高議》的佚文」。⁸

主張「隋煬帝三記」皆為晚唐作品的學者，以李劍國為主，首先詳論於其《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中⁹，後為回應章培恒所主張的宋人說，李氏針對避諱一事詳加論述，重申包括「隋煬帝三記」在內之五篇傳奇為晚唐作品：〈大業拾遺記〉「作於宣宗大中間」，〈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等「出於唐末僖、昭、哀這三十多年間，殆無疑焉。」¹⁰另外，日本河野真人〈「隋煬帝艷史」に於ける「隋遺錄」「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の襲用について〉一文，討論《隋煬帝艷史》對〈大業拾遺記〉、〈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的承襲，亦推測〈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作於宋代以前。¹¹

餘當亦同」，且從題材上看，認為「帝王縱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樂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則益以隋煬」，但沒那麼重視教化，多從興趣出發。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頁 78；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頁 143-165。

⁶ 〈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是北宋人所作，「明顯地影射著北宋後期的現實，小說中的隋煬帝與宋徽宗，有著十分驚人的相似之處。」在藝術上也顯示出以史事為題材的傳奇小說的進一步成熟。它們以隋煬帝那段歷史為基礎，進行了廣泛的藝術虛構，已絕非歷史，卻又再現了歷史的真實。」蕭相愷：《宋元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頁 340-341。

⁷ 首先，由於〈海山記〉收錄於《青瑣高議》；且陳與義作於建炎 4 年的〈虞美人邢子友會上〉已用〈迷樓記〉典故，建炎年間又兵荒馬亂，〈迷樓記〉若作於此時，陳與義未必能得而一見，因此章培恒認為〈迷樓記〉與〈海山記〉俱應作於北宋。〈開河記〉開頭「睢陽有王氣出」，而歸德軍治所在宋州、宋州治所在睢陽，因此隱射《舊五代史·恭帝紀》所載禪位詔書之「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即為天子；又著錄於《遂初堂書目》，所以章氏認為〈開河記〉至遲為南宋前期所作。見章培恒：〈〈大業拾遺記〉、〈梅妃傳〉等五篇傳奇的寫作時代〉，《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5：1（2008.1），頁 106-110。郭紹林又舉宋代始有的雙調五十四字〈望江南〉詞、運用如同〈驪山記〉「作偽亂真」的手法來討論〈海山記〉。見郭紹林：〈舊題唐代無名氏小說《海山記》著作朝代及相關問題辨正〉，《洛陽師專學報》17：1（1998.2），頁 57-62。

⁸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84-85。

⁹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頁 894-903。

¹⁰ 李劍國：〈《大業拾遺記》等五篇傳奇寫作時代的再討論〉，《文學遺產》1（2009.1），頁 21-28。

¹¹ 〔日〕河野真人：〈「隋煬帝艷史」に於ける「隋遺錄」「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の襲用について〉，《中國文學論集》28（1999.12），頁 51-67。不過，本文只說〈海山記〉由於被收錄於《青瑣

可見「隋煬帝三記」的撰作時代迄今仍未有定論，主張「唐人說」或「宋人說」者，各有其立場；且過去論述「隋煬帝三記」之學者，往往將「三記」視為一整體，證明其中一或兩篇為某朝代，則三篇盡為某朝代。本文認為與其先接受所謂「唐人說」或「宋人說」再提出所謂藝術上的特色¹²，不如先由文本內部細節剖析，設法通過個別隋煬帝故事的內容、敷衍故實的傳奇手法、「隋煬帝三記」之照應比較，並與其他類似論述模式之小說進行對比，尋繹其撰作時代，實為「隋煬帝三記」的綜合研究。

二、以述代論的〈海山記〉

〈海山記〉收錄於《青瑣高議》後集內，分上、下兩篇，上篇有一小標題：「記煬帝宮中花木」，下篇則另有標題：「記登極後事跡」，明確標示兩篇之重點，細觀內容，〈海山記下〉雖全記載「登極後事跡」，但〈海山記上〉卻非全記煬帝西苑花木，此內容佔上篇篇幅不及六成，更何況〈海山記〉篇名即以煬帝西苑花木湖海風光為

高議》，因此推測作於宋代之前，而〈開河記〉、〈迷樓記〉則從文辭上看來似乎與〈海山記〉出於同一人之手，從而推測三記的撰作時間。

¹² 如夏秀麗：〈《大業拾遺記》與《隋煬三記》淺析〉，《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7：5（2010.10），頁44-47；李菁：〈唐傳奇文《煬帝開河記》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0（2012.3），頁32-38；齊淑慧：〈唐末傳奇文《煬帝開河記》研究〉，《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2014.2），頁415-416。夏氏以李劍國考證結果為基礎，認為〈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與〈大業拾遺記〉同為晚唐的歷史題材傳奇小說，並以此說明其藝術特色：作者稱讚這四篇小說呈現一種「無我」之境，是唐傳奇在藝術上的一種進步：「這幾篇小說，雖以歷史批判為主旨，但敘述卻十分客觀冷靜。……這不類唐代另外一些優秀傳奇作品在文後加入論贊式文字來彰顯自己的創作意圖的創作形式。」又說：「隋煬三記」的內容多有相合映襯之處、行文筆法亦十分相似，且語言文辭俚俗，「與史傳文學風格已不相類，體現了唐傳奇發展變化的一種新動向，宋人小說中一些涉及歷史題材的作品，如秦醇〈驪山記〉、〈溫泉記〉，風格偏於通俗豔情，可謂與這幾篇作品一脈相承。」（頁46）李氏同樣以李劍國的考證結果為基礎，認為〈開河記〉是唐代傳奇文，但又同時評論其文采平實，不類唐人傳奇：「起伏不顯，波瀾不驚，基本上是平鋪直敘一路到底，文采實無可取」、「與〈大業拾遺記〉中盡陳宮闈韻事以悅人情的綽約豔麗相比，可資觀覽者實在不多」（頁33）；再通過《西京雜記》與〈開河記〉之對照，可見其間「附會曼衍」之痕跡。至於齊氏則綜合以上兩人之說。

命名根源，而此部分篇幅卻不及全篇四分之一。¹³再縱觀〈海山記〉全篇，在煬帝築西苑前，先依序敘述其生時、三歲、十歲、文帝崩、楊素死等諸事，至大業 6 年西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後，則以記載災祥、夢兆為主，再紀錄王義上書評論煬帝得失事，最後結束於司馬德戡逼煬帝自縊；以下就煬帝「生長、即位、死亡」，「羅列西苑鳥獸草木」，「災祥、夢兆」，「王義上書」等四部分，分別論述，同時，進一步探討「西苑鳥獸草木」部分何以能成為〈海山記〉記載隋煬帝事蹟的重點之一。

首先，〈海山記〉基本上採取編年架構，由隋煬帝出生寫至死亡，頗符合一般人物傳記之寫法，且內容以史傳為基礎，略為簡省或改動，如《隋書》記載隋煬帝深諳人心，懂得投高祖與獨孤皇后喜好：

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上好學，善屬文，深沉嚴重，朝野屬望。……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¹⁴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4-95）

高祖及獨孤皇后皆愛隋煬帝儉樸、不好聲色，但煬帝不過是「矯情飾貌」而已，因此〈海山記〉稱煬帝「性偏忍，陰默疑忌，好鉤踐人情深淺」。¹⁵至於〈海山記〉最後「司馬德戡攜刃伺帝，帝叱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戡曰：『臣實負陛下。但見今兩京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根

¹³ 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93-100。

¹⁴ 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頁 59。以下所引《隋書》，皆同於此，僅在引文後標示書名、卷次、頁碼，不另出注。

¹⁵ 〈海山記〉情節、文字俱依李劍國《唐五代傳奇集》據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青瑣高議》後集卷 5〈隋煬帝海山記〉校錄，後皆出於此。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2641-2651。

據《隋書》，實際逼迫煬帝自絕者為裴虔通，但司馬德戡為主事者：

大業三年，（司馬德戡）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貴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隋書·司馬德戡傳》，卷 85，頁 1893）

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貴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貴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隋書·宇文文化及傳》，卷 85，頁 1890）

〈海山記〉完全不寫裴虔通而盡歸於司馬德戡，採取去除枝蔓的寫法，與上述描寫隋煬帝「矯情飾貌」部分相似，可見以史傳為基礎而省略非重點的情節、一筆帶過的寫法。

相對於〈海山記〉以史書記載為基礎而稍微減省之筆法書寫煬帝早年、死亡情節，在楊素矯詔擁立煬帝一事上，卻詳細書寫：楊素先不從高祖臨終所交待之「吾若不諱，汝立吾兒勇為帝」，爾後高祖崩，楊素先「不發喪」，次日再「袖遺詔立帝」，並「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且〈海山記〉記載與《隋書》睽異：「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隋書·煬帝紀上》，卷 3，頁 60）可見〈煬帝紀〉明白記載隋煬帝先被立為皇太子，及高祖崩後順理成章地即位，因此，魏徵於〈高祖紀〉評議高祖「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一則可見隋高祖確有廢太子勇、立煬帝之事，二則說明魏徵認為隋高祖無故廢黜嫡長子楊勇之舉動，是隋朝亂亡之源：「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隋書·高祖紀上》，卷 2，頁 55-56）

其次，雖然《隋書》記載隋高祖先廢太子楊勇、後立楊廣為太子，煬帝並非高

祖死後才倚靠楊素奪得帝位，但煬帝之立仍與楊素有關：首先是煬帝刻意與楊素交好¹⁶，第二是討好獨孤皇后¹⁷，最後通過此二人，干擾了隋高祖廢立太子之決定¹⁸，由此可見，楊廣之所以能被高祖立為太子，楊素確實出謀劃策功不可沒，而〈海山記〉為強調煬帝「奪宗」一事，遂改為楊素矯詔擁立煬帝，如此一來，煬帝得位更顯得非比尋常，不出於高祖意志。

至於〈海山記〉以隋煬帝為主卻別樹一段書寫楊素驕奢，實為強調楊素不奉高祖臨終詔命，對煬帝自恃擁立之功，因此先特地用楊素之口說：「小兒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又稱楊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為郎君」，且再三描寫楊素自恃有功而益加驕橫：「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甚至敘述煬帝見楊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威儀」，使得煬帝對之大為疑忌。檢閱史書，楊素雖然因擁立煬帝有功，但也因此引起煬帝猜忌：「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隋書·楊素傳》，卷 48，頁 1292）且楊素矜功自伐並非全因擁立煬帝使然，隋高祖時，楊素即有「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因此高祖「漸疎忌之」（《隋書·楊素傳》，卷 48，頁 1288）；煬帝時，楊素「負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隋書·楊素傳》，卷 48，頁 1292），可知楊素之所以引起煬帝猜忌，或與其富可敵國、挾朋樹黨的行為有關，並非單純因擁立之功。只是〈海山記〉為凸顯隋煬帝因母愛而「奪宗」得位、側重非楊素擁護則不當即位，既不提高祖時楊素即驕奢無度之史實，也不說楊素實因富可敵國、挾朋樹黨而引起煬帝猜疑，只敘述楊素無視煬帝、怙寵矜功的狂妄驕恣舉止。

因此，在關於煬帝生長、即位、死亡之事上，由於史傳皆有記載，〈海山記〉則

¹⁶ 「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唐·魏徵等撰：《隋書·楊素傳》，卷 48，頁 1286。

¹⁷ 「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4。

¹⁸ 「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穎，廢太子勇為庶人，晉王鈞虛名而見立。」唐·魏徵等撰：《隋書·五行志下》，卷 23，頁 655。

以史傳為基礎，或略為減省，或稍作更動，為的是呼應《隋書》的歷史評議：隋煬帝「性偏忍，陰默疑忌，好鉤躓人情深淺」，並以此取得母親獨孤皇后的偏愛與信任，讓本不當為帝的煬帝能順利由兄長手中奪取帝位；這樣的評議，並不用史書論贊的形式為之，而採取敘述故事之輕描淡寫或重筆濃墨表現。

至於史傳未有記載之事，〈海山記〉則參考史載結果，再行創作，如〈海山記〉一連記載的兩則災祥及兩則夢兆之說。就災祥而言，一是以宮中後苑楊梅、玉李之榮枯預言楊隋、李唐之興衰，因此楊梅盛而煬帝喜、玉李盛而煬帝憂：

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日，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嘆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來報：「楊梅已枯死。」（《唐五代傳奇集》，頁 2646-2647）

二是拆析「解」字及鯉、李諧音，說明鯉（李）有角將為龍，暗示李唐將興：

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曰：「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后同見，此魚之額上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有角字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為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入沉水中。（《唐五代傳奇集》，頁 2647）

表面上，〈海山記〉運用諧音、拆字預示歷史發展，但事實上是作者已經掌握唐將代隋而興的歷史結果，才以此創作傳奇小說。

第二，就夢兆來看，先有隋煬帝夢陳後主對之說：「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預示了隋煬帝葬於吳公臺之事，此事亦出於史傳所載：

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為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眾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93-94）

二有院妃慶兒的夢，預示煬帝大業10年隋朝乃亡：

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乃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唐五代傳奇集》，頁2647-2648）

這種以夢兆預示歷史的寫法，前者是作者已經知道隋煬帝先葬於吳公臺下，才以此創作故實，然而，後者藉院妃慶兒夢皇帝坐於烈焰之中，預示煬帝大業10年隋亡一事，卻與《隋書》、《舊唐書》記載不同：大業13年11月「唐公入京師」，「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93）可見，大業13年，李淵入長安，先尊隋煬帝為太上皇，再奉楊侑為恭帝以篡隋，次年隋煬帝崩於江都、李淵即皇帝位。¹⁹

〈海山記〉在史傳未載之災祥、夢兆故事上，先根據歷史結果，再創作故實；而史傳具體清楚記載大業13年隋亡之事，〈海山記〉卻改為大業10年隋亡，其實亦根據史傳而來：自大業9年12月以後，百姓紛紛起兵作亂，自稱天子、皇帝、自立國號，有向海明²⁰、唐弼²¹、劉迦論²²、王須拔²³、李子通²⁴、荔非世雄²⁵、操天成²⁶、

¹⁹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高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頁4-6。

²⁰ 大業9年12月，「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86。

²¹ 大業10年2月，「扶風人唐弼舉兵反，眾十萬，推李弘為天子，自稱唐王」。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87。

²² 大業10年5月，「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87。

²³ 大業11年2月，「上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

林士弘²⁷、竇建德²⁸、梁師都²⁹、李密³⁰、薛舉³¹、李軌³²，迄至大業 13 年 11 月「唐公入京師」、「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3），其間還有更多其他起兵反叛卻未稱王的，可見隋煬帝大業 9 年 12 月之後，動亂如燎原之火，使得國家危如累卵。因此〈海山記〉藉院妃慶兒之夢稱煬帝 10 年隋亡之事，並非故弄玄虛或單純作意好奇而虛構情節，實為表達煬帝 10 年以後，各地叛軍自稱天子、自立為王、甚至另立國號，無不表示煬帝 10 年後，朝廷日益勢微，至於叛軍之勢焰薰灼，更使隋煬帝如「坐烈焰中」，焦頭爛額而不可救；而這些歷史觀點、歷史評議卻不出於議論文字，反而出以敘事、敷衍傳奇。

又如〈海山記〉以將近全篇三分之一的篇幅記錄隋煬帝遇害前數日，王義上書內容：

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逾於萬艘，宮闕遍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還往，行幸無時。兵士時從常逾百萬，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為墟。方今百姓

卷 4，頁 89。

²⁴ 大業 11 年 10 月，「東海賊帥李子通擁眾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89。

²⁵ 大業 12 年 9 月，「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1。

²⁶ 大業 12 年 12 月，「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1。

²⁷ 大業 12 年 12 月，「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1。

²⁸ 大業 13 年正月，「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1。

²⁹ 大業 13 年 2 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2。

³⁰ 大業 13 年 2 月，「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2。

³¹ 大業 13 年 4 月，「金城校尉薛舉率眾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2。

³² 大業 13 年 7 月，「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唐·魏徵等撰：《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2-93。

存者無幾，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鳥鳶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如山。膏涂野草，狐鼠特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即令賜死。臣下相顧，緘口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為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消爍？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唐五代傳奇集》，頁 2649-2650）

首先標舉煬帝剛愎自用、不納諫諍，其次是煬帝大興宮苑、遊逸享樂，大動干戈、征伐遼東，兩項皆為勞民傷財之事，並認為這些是煬帝失去天下的真正因素，前者與《資治通鑑》所敘述者頗為相符：「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³³又如《隋書》所說：「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95）。後者則如《資治通鑑》所敘述：

詔毘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仿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群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壬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守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³⁴

這些皆為大業 12 年之事，其時隋代已近覆亡，而煬帝仍沉湎淫逸。又或者如《隋書》

³³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唐紀》（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85，頁 5776。

³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隋紀》，卷 183，頁 5702-5705。

所說：「以天下承平日久，土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疎儉者獲罪。」（《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94）可見，〈海山記〉之王義上書內容並無新意，應為唐、宋史家的普遍觀點，而〈海山記〉吸納了這些歷史評價，重新創作「王義」其人、「上書」一事以綜合前代史論，最後出以強烈語氣措辭：「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一連使用三個反詰，藉王義的慷慨陳詞來表達〈海山記〉作者的歷史評議。

不過，不論是「煬帝生長、即位、死亡」，「災祥、夢兆」，「王義上書」三者，俱與〈海山記〉之標題或《青瑣高議·海山記上》的小標題「記煬帝宮中花木」相距較遠，真正符合「海山」及「記煬帝宮中花木」之題者，唯有「西苑鳥獸草木」一段：隋煬帝「闢地周二百里為西苑，役民力常百萬」，有十六院，「聚土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四海」，並大量且詳細地羅列天下進獻的鳥獸草木：十六種梨、十色桃、十色棗、五色櫻桃、三種栗、十色李、三色梅、五色荔枝、八般木、二十相牡丹等，甚至藉隋煬帝之口作〈望江南〉八闋，細數西苑湖海的「湖上月」、「湖上柳」、「湖上雪」、「湖上草」、「湖上花」、「湖上女」、「湖上酒」、「湖上水」。

就〈海山記〉的結構來看，羅列宮中花木一段，前承隋煬帝因楊素而登帝位、楊素死的情節，寫道：「帝自素死，益無憚。乃辟地周二百里為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後啟後苑草木鳥獸的各種災祥應讖、煬帝遇害等情節：「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蔭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大內廚開為御路，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唐五代傳奇集》，頁2643-2645），形成〈海山記〉整體結構如下：

奪帝位→闢西苑→見凶兆→終亡國

可見，〈海山記〉大篇幅的羅列山、湖、花、木，雖然在情節推展上乍看有所窒礙，但實則藉此批評隋煬帝以自己富有四海而驕矜，過分奢靡、盡情縱欲，連禍兆出現還強自辯解、不思振作，終致應讖亡國，具備轉折引導之作用，同時，也暗示了〈海

山記〉的歷史觀點：表面上用玉李勝於楊梅等「天意」包裝，但並非訴諸神秘的命定之說，展現出隋煬帝實自取滅亡的理性思考。

這種表面羅列物品、實際卻造成情節轉折的傳奇寫法，令人聯想至北宋秦醇〈驪山記〉：由敘述盛唐富貴鼎盛的氣象，聯想至象徵富貴雍容的牡丹花，從而介紹了「一捻紅」、「御衣黃」、「甘草黃」、「建安黃」、「一尺黃」等五種不同品種的牡丹，更重要的是，利用玄宗喜愛牡丹花及排列簡短的花譜，則使〈驪山記〉內容順利導入楊貴妃美豔的尤物想像，成為傳奇情節的重要轉折。³⁵

至於上述先根據歷史結果，再創作災祥、夢兆故實之情節設計手法，亦令人聯想到北宋傳奇〈玄宗遺錄〉：楊貴妃夢見與唐玄宗同遊驪山，忽發大火，「驛木俱為烈焰」，唐玄宗令楊貴妃「受益州牧蠶元后，仍賜絲百鎰」；其中，運用了諧音：「同遊驪山，驪與離同音」、諧音及拆字：「驛木俱焚，驛與易同音，易旁木，楊字也，俱焚乃滅族之象也」、「益州牧蠶，蠶必有絲，絲而加益，鎰字也」³⁶，而唐代書寫玄宗貴妃故事的詩文、傳奇、筆記皆未嘗見這種寫法，傳奇小說以歷史事實敷衍為災祥、夢兆故實之寫法，自北宋始見。

甚至，〈海山記〉中隋煬帝對王義說：「卿為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與北宋傳奇〈楚王門客〉，敘述劉大方夢見楚霸王項羽詢問的話非常接近：「子言漢所以得，吾所以失，吾將知過焉。」³⁷同樣地，〈楚王門客〉亦借劉大方之口條列項羽的十項過失，且這十項過失散見於《史記》高起、王陵之說、陳平之說、韓信之說等³⁸，是〈楚王門客〉藉著劉大方之口說出的歷史評議，也充滿了北宋人理性思考後所反省總結的歷史教訓³⁹；〈海山記〉的王義上書內容，同樣展現這樣的理性思考。

由於〈海山記〉被收入《青瑣高議》後集卷5，雖然未必是劉斧所撰，但魯迅、程毅中等學者俱以為〈海山記〉應為宋人所作。尤其，本文由「煬帝生長、即位、

³⁵ 趙修霽：《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頁79-81。

³⁶ 宋·無名氏：〈玄宗遺錄〉，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36-239。

³⁷ 宋·劉斧：〈楚王門客〉，收入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頁274-277。

³⁸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8，〈高祖本紀〉，頁380-381；卷56，〈陳丞相世家〉，頁2055；卷92，〈淮陰侯列傳〉，頁2612。

³⁹ 趙修霽：《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頁223-228。

死亡」，「羅列西苑鳥獸草木」，「災祥、夢兆」及「王義上書」四部分來看，可見〈海山記〉敷衍故實之手法與北宋歷史傳奇如出一轍，與《青瑣高議》前集〈驪山記〉、別集〈楚王門客〉及收錄於劉斧《翰府名談》的〈玄宗遺錄〉雷同，更可以看出〈海山記〉具備北宋傳奇敷衍故實的特徵，甚至可以推測或劉斧所撰、或劉斧所收錄，與《青瑣高議》有著密切的關係。⁴⁰

〈海山記〉全篇的歷史議論皆轉化為故事情節，唯有針對煬帝開河一事，藉陳後主在隋煬帝夢中作詩一首進行直接評論：

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奢。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反，龍舟興已遐。溢流隨陡岸，觸浪噴黃沙。兩人迎客遡，三月柳飛花。日腳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投子俗，異日便無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漢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唐五代傳奇集》，頁 2646）

〈海山記〉認為隋煬帝開鑿運河，一開始是為了遊樂，由這個角度來看，確實既勞民且傷財，不過，對於後世而言，卻有著極大的好處，京畿一帶因汴渠疏通漕運而能繼續繁榮。

初唐朱敬則〈隋煬帝論〉即認為隋煬帝荒淫無度，所以使得「小人方興，群盜孔熾」，而天下成為鬥戰之場時，隋煬帝反而勞師動眾遊幸揚州：「天子乃幸維揚，泛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最後「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⁴¹，全未提及開鑿運河的好處，汴渠只是隋煬帝逸樂之象徵。不唯朱敬則如此，中唐白居易〈隋堤柳〉談及隋煬帝汴渠時，也認為隋煬帝開汴渠是為了南幸江都、尋歡遊逸：「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繫龍舟。」並因此耗盡了國庫，置國家政局於危險不安：「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

⁴⁰ 李劍國認為《青瑣高議》初成於至和末，之後劉斧又不斷增補，最後定稿時間約在哲宗元祐間。見於氏著：《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頁 182-183。

⁴¹ 唐·朱敬則撰：〈隋煬帝論〉，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71，頁 769-770。

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最終在遊幸途中，義軍四起、進入京都，隋朝因而覆亡：「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⁴²詩中雖然充滿對隋煬帝亡國的哀憫，但仍可以看到白居易對於煬帝開鑿汴渠只提及勞民傷財、導致亡國一事，並不存在正面看法。至晚唐詩人作詩詠史，亦多論遊逸之失而少正面評價，如許渾〈汴河亭〉：「廣陵花盛帝東游，先劈昆侖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凝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全唐詩》，卷 534，頁 6094）羅鄴〈汴河〉：「煬帝開河鬼亦悲，生民不獨力空疲。至今嗚咽東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時。」（《全唐詩》，卷 654，頁 7522）羅隱〈汴河〉：「當時天子是閒遊，今日行人特地愁。柳色縱饒妝故國，水聲何忍到揚州。乾坤有意終難會，黎庶無情豈自由。應笑秦皇用心錯，謾驅神鬼海東頭。」（《全唐詩》，卷 655，頁 7532）而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雖然看到了汴河之利，卻仍說：「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全唐詩》，卷 508，頁 5776）僅有皮日休一人在〈汴河懷古之二〉中，提到隋煬帝開汴河的貢獻：「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全唐詩》，卷 615，頁 7099）不過，仍是不忘提醒：隋煬帝開河為的是逸樂（「水殿龍舟」），倘若不曾利用運河遊樂，則可與大禹治水之功相提並論。由此可見，終唐之世對汴河的普遍觀點即偏重遊樂與亡國的負面評價。

這樣的觀點至宋代即產生轉變，如北宋初期張洎對宋太宗論及汴水疏鑿曰：

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畝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⁴³

⁴²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427，頁 4708-4709。以下所引《全唐詩》，皆同於此，僅在引文後標示書名、卷次、頁碼，不另出注。

⁴³ 元·脫脫等撰：《宋史·汴河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93，頁 2321。

雖然汴渠是隋煬帝為巡遊而開，但京師之財貨往來皆仰賴此漕運，所以一則感嘆這條為巡遊天下而開鑿的汴渠「終為國家之用，其上天之意乎」，二則並論治水有功的大禹與隋煬帝，雖然與晚唐皮日休「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之說類似，但仔細對比兩者，皮日休說：若隋煬帝開鑿汴河非為逸樂，其功可與治水的大禹倫比；張洎則說：雖然隋煬帝開汴以奉巡遊，但對後世而言，仍與大禹力疏鑿以分水勢，一樣重要，可知張洎對隋煬帝開汴渠評價之高，並不因其原始動機而減損。

之所以如此，應與北宋汴京對於汴渠漕運之依賴有關，如北宋仁宗時人黃庶〈汴河〉詩：

汴都峨峨在平地，宋恃其德為金湯。先帝始初有深意，不使子孫生怠荒。萬艘北來食京師，汴水遂作東南吭。甲兵百萬以為命，千里天下之腑腸。人心愛惜此流水，不啻布帛與稻粱。漢唐關中數百年，木牛可以腐太倉。舟楫利今百於古，奈何益見府庫瘡。天心正欲醫造化，人間豈無鍼石良。窟穴但去錢穀蠹，此水何必求桑羊。⁴⁴

其中，黃庶將汴渠比喻為影響百萬甲兵之命脈、廣袤天下的臟腑，認為過去唐代以前運用木牛運輸兵糧，已經使太倉失去囤積粟米以平穩物價的功能，而今日利用汴渠之漕運功能，好處更是比過去多出百倍，甚至說「此水何必求桑羊」，只要有了汴渠，就算沒有桑弘羊，國家財政也不怕出問題。自始至終，對於隋煬帝為巡遊而開鑿運河，隻字未提，只專論汴渠的經濟功能，而推崇備至。

北宋神宗時人張方平任宣徽北院使時，同樣有此主張：

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⁴⁵

可見自北宋初至北宋中後期，汴渠仍被視作「建國之本」，京師軍民士庶皆仰賴汴渠

⁴⁴ 宋·黃庶：《伐檀集·汴河》卷上，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623。

⁴⁵ 元·脫脫等撰：《宋史·汴河志上》，卷93，頁2323。

輸運糧米。對比唐、宋人對汴渠之觀點，可知〈海山記〉借陳後主鬼魂所持的議論「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更近於北宋人之觀點，且與北宋汴京的實際漕運需求有著密切之關係，因此，〈海山記〉能兼顧汴渠正、反兩面觀點的評價，不當出於唐人所論，應為北宋人所作。

職是之故，〈海山記〉除了陳後主在隋煬帝夢中作詩直接評論開鑿汴河一事外，通篇各項情節亦充滿歷史議論：據史傳而改的「生長、即位、死亡」部分，採取或輕描淡寫、或重筆濃墨之敘事，以批判隋煬帝本不當為帝卻能因母親獨孤皇后的偏愛而即位，呼應《隋書》論贊；「災祥、夢兆」部分，亦根據唐代隋而興的歷史結果、及煬帝大業 10 年以後，各地叛軍勢焰薰天，隋煬帝如「坐烈焰中」的歷史觀點，造作故實敷衍傳奇；吸納史書的歷史評價後，藉「王義上書」一段情節進行歷史評議；「羅列西苑鳥獸草木」一段則在結構上具有轉折引導之作用，並藉此批評隋煬帝過分奢靡、盡情縱欲，是自取滅亡。以上種種，〈海山記〉皆非直接議論，而是將深刻之歷史批判轉化為敘述隋煬帝故事，用「以述代論」的手法為之。

三、歷史衍異的〈開河記〉

〈開河記〉開頭即說：「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⁴⁶上文已述，章培恒通過此說，及歸德軍治所在宋州、宋州治所在睢陽，說明〈開河記〉暗示原為「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之宋太祖趙匡胤應為天子，從而證明〈開河記〉當作於宋代。不過，主張〈開河記〉作於晚唐之李劍國認為，所謂「睢陽有王氣出」，是為了「順理成章地引出宋司馬華元和宋襄公，以表現鬼神的怨憤和責罰」；因此「睢陽有王氣出」、「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之說，只是要引出

⁴⁶ 〈開河記〉情節、文字俱依李劍國《唐五代傳奇集》據上海涵芬樓排印張宗祥校明鈔本《說郛》卷 44〈煬帝開河記〉校錄，後皆出於此。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2668-2678。

開河、掘墓一系列情節，「並無特別寓意」。⁴⁷

其實，〈開河記〉所謂「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運用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⁴⁸典故，而《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時，又可配合《孟子》排列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皆五百多年的文化傳統⁴⁹，一方面可明白孟子自覺必須擔負起承繼文化的責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⁵⁰另一方面，則擔憂後世失去此一文化傳統：「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⁵¹因此，李劍國認為〈開河記〉只是「套用」《孟子》之說，「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的「五百年」是空泛之言，用以表達王朝興廢的觀念，未必有特定的指向⁵²，實未必然，因為〈開河記〉其實不是簡單運用「五百年」的時間典故，小說中尚有其他相關線索，且與《孟子》「五百年」文化傳統之承繼思想相合，值得深入仔細推敲。

首先，由「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來看，〈開河記〉敘述麻叔謀開河至睢陽界時，夢使者召至宮殿，見「衣絳綃，戴進賢冠」之宋襄公（前 650-前 637），宋襄公自稱「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又稱「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此處共有兩個時間點：一是隋煬帝後五百年左右將有天子興、有王者建萬世之業，二是上帝命宋襄公鎮守睢陽二千年；而隋煬帝在位十四年（604-618），倘若往後推算五百年左右，當在北宋徽宗（1082-1135）至南宋高宗（1107-1187）之間，配合宋襄公死後將繼續在睢陽鎮守二千年，則北宋徽宗、欽宗、南宋高宗皆在其負責的時限之內。再輔以「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這樣的文意，通常用在預言開國之君上，表達王朝氣數之興衰，就北宋徽宗、欽宗及南宋高宗而言，當以南宋高宗更符合「天子興」

⁴⁷ 李劍國：〈《大業拾遺記》等五篇傳奇寫作時代的再討論〉，頁 25。

⁴⁸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4，〈公孫丑章句下〉，頁 250。

⁴⁹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14，〈盡心章句下〉，頁 376。

⁵⁰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4，〈公孫丑章句下〉，頁 250。

⁵¹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14，〈盡心章句下〉，頁 377。

⁵² 李劍國：〈《大業拾遺記》等五篇傳奇寫作時代的再討論〉，頁 24-26。

的說法；且《孟子》在「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後，接著又說：「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正與北宋末靖康之亂，宋室盡為金人北擄，南宋高宗即位，確實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因此〈開河記〉所謂隋煬帝「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宋襄公「鎮此方二千年」，應非如李劍國所說「無特別寓意」。

其次，章培恒曾說〈開河記〉之「睢陽有王氣出」實為暗示曾任「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之宋太祖趙匡胤應為天子，而趙匡胤確實曾任歸德節度使、駐於宋州，此地又為春秋時期宋國故地，這也是後來趙匡胤定國號為「宋」的原因⁵³；趙匡胤為宋朝開國之君，與「當有天子興」句意雖合，卻不符合「後五百年」的時間，不過，其實睢陽不只與宋太祖有關，也關聯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宋高宗的登基即位之地即在睢陽⁵⁴，因此，綜合時間「五百年」、地點「睢陽」、文意「當有天子興」及《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典故，可知〈開河記〉應為南宋高宗初期的文人所作，其經歷靖康之亂，由北宋入南宋，為提振國家士氣，期許南宋高宗可以「平治天下」、「建萬世之業」。

職是之故，〈開河記〉安排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襄公現身，實是作者在南、北宋之間，恰巧是隋煬帝後五百年，因而運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典故，並改為「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再通過宋太祖定國號為「宋」的歷史事實，安排宋襄公出現；更進一步地，通過二千年間睢陽守護神宋襄公之口，說出「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更具說服力。甚至，提及睢陽，亦非僅著眼於王氣，〈開河記〉此段曾六次提及「護城」一詞：三次「迴護」此城、三次「護城之事」，而麻叔謀夢中，宋襄公苦勸麻叔謀護城改道而無功後，真正成功勸阻麻叔謀穿透睢陽城者，即為春秋時期守護宋國有功之司馬華元。⁵⁵經此仔細推敲，〈開河記〉睢陽一段

⁵³ 徐俊：《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名號探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50。

⁵⁴ 「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康王即位于南京」。宋代的應天府即隋、唐的宋州，亦為宋之南京，「以宋州為應天府」；「應天府，河南郡，歸德軍節度。本唐宋州。……景德三年，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為南京。」上引分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24，〈高宗本紀〉，頁 442；卷 23，〈欽宗本紀〉，頁 436；卷 7，〈真宗本紀〉，頁 130；卷 85，〈地理志一〉，頁 2110。

⁵⁵ 由於宣公 14 年秋，楚王派兵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

各項線索：時間、地點、人物、文意及典故皆環環相扣，彼此密切相關，如密織之網，牽一髮而動全身，絕非「無特別寓意」一語所能輕易帶過。〈開河記〉運用相關故實層層摹衍為隋煬帝開河至睢陽之情節，不僅就內容可推測應作於南宋高宗初期，就其彼此連環扣合卻又不根據史實、憑空摹衍的歷史衍異手法，亦可判斷當承襲自北宋傳奇。⁵⁶

另一方面，宋襄公責備隋煬帝「豈可偶為遊逸，致使掘穿王氣」，蕭相愷認為這是隱喻宋徽宗亦為好遊逸之皇帝、影射北宋後期的現實。⁵⁷有趣的是，隋煬帝及宋徽宗之共同點，其實不只好遊逸一事：若如上文所論，〈海山記〉或劉斧所撰、或劉斧所收錄，與《青瑣高議》有著密切的關係，因而最遲作於哲宗元祐間；由此，作於南宋高宗初期的〈開河記〉即可運用〈海山記〉內批評隋煬帝本不當為帝卻能因母親偏愛而即位之故實⁵⁸，而宋徽宗之所以即位為帝，也是因為其兄哲宗無子而崩、向太后極力堅持所立。⁵⁹因此〈開河記〉通過隋煬帝及宋徽宗在即位上的共同點，將兩者聯繫起來，再藉表面上批評隋煬帝，實則暗批宋徽宗因好遊逸而致國家於險

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宣公十五年》，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卷24，頁408。「文公十六年……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漢·司馬遷：《史記·宋微子世家》，卷38，頁1629。

⁵⁶ 如趙修需：《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頁91-124、124-164。第四章〈「楊貴妃」主題三：從「楊妃」到「梅妃」〉論述〈梅妃傳〉運用白居易詩作〈長恨歌〉及〈上陽白髮人〉之典故及隱喻，使得唐玄宗、楊貴妃、梅妃故事在漢武帝、陳皇后、李夫人的身影中，交疊現身。第五章〈「成仙」之途：因才高而成仙的概念完成〉亦論述〈書仙傳〉基本人物特徵與唐傳奇〈文簾〉相似，並以李賀臨終傳說設想書仙臨終情景、書仙、夭殤年齡等。可見，〈梅妃傳〉或〈書仙傳〉皆屬於不根據史實、運用相關故實層層摹衍而成的北宋傳奇。

⁵⁷ 蕭相愷：《宋元小說史》，頁340-341。

⁵⁸ 宋·車若水：《腳氣集》卷上也有類似看法：「晉王廣之得帝位，自是造物之所不容。」收入新興書局輯：《筆記小說大觀·四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89），頁1580。

⁵⁹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簾，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對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王當立。』惇又曰：『以年則申王長，以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難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元·脫脫等撰：《宋史·徽宗本紀一》，卷19，頁357。

境。

此外，〈開河記〉全篇以麻叔謀開河為線索，但至彭城遇偃王墓後，卻忽然開始敘述隋煬帝讀書見秦始皇築長城事，而下詔續其事，此後才又回到麻叔謀開汴渠事；雖然開運河、修長城都是隋煬帝的政治成績，也是民怨來源，但將修築長城事橫插在開運河諸事件中必有其緣故，且特別在偃王墓後提及修長城亦值得進一步思考。

彭城附近的偃王墓，指的應為西周的徐偃王；徐偃王歷來有「仁義」的名聲，甚至最後死於「仁義」之名，如《韓非子·五蠹》欲說明古可行仁義，但今仁義不行，即舉徐偃王為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⁶⁰

而《韓非子·喻老》亦直言徐偃王「以名號為罪」，意即徐偃王因標舉「仁義」而被戮，因此以晉文公之「此（豐狐、玄豹）以皮之美自為罪」喻之。⁶¹至於《後漢書·東夷列傳》則析論徐偃王之所以亡於仁義的原因：

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⁶²

范曄認為徐偃王因行仁義，即便發生戰爭也不願塗炭生靈，所以不擴展軍事權力，最後為楚所滅。對此，張璠《漢紀》說：「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⁶³劉璋和宋襄公、徐偃王一樣，並非無德、不行正道的

⁶⁰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五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 49，頁 1092。

⁶¹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喻老》，卷 21，頁 432。

⁶²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東夷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5，頁 2808。

⁶³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劉璋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1，引張璠《漢

國君，只是略為愚弱。唐代柳宗元〈佩韋賦〉亦認為徐偃王國滅身死的原因，是推行實為柔弱的仁義：「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過與不及皆不宜，應以「和以義宣，剛以柔通」⁶⁴的中和之道治國處世。可見，唐代以前，凡論及徐偃王行仁義，多以為其太過愚弱。

不過，韓愈撰〈衢州徐偃王廟碑〉採取不同的角度：

徐與秦俱出栢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秦傑以顛，徐由遜綿。秦鬼久饑，徐有廟存。⁶⁵

韓愈採用對比方式行文，首次將徐偃王與秦始皇並論：以徐偃王與秦始皇俱出於栢翳、嬴姓，但前者重文德，後者用武勝；前者因仁義而著名，後者則被人冠以暴虐；而徐偃王的仁德正是後世子孫綿延、祭祀不絕的理由，相對而言，秦始皇的子孫四散、無人奉祀。其實，徐偃王、秦始皇正好是柳宗元〈佩韋賦〉所說的兩種典型：「純柔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就柳宗元之說而言，兩者皆不可取；但韓愈不由此立論，既然人皆有一死，倘若由死後子孫綿延奉祀的觀點來看，徐偃王仁義、秦始皇暴虐之結果就自然對比出來。因此，以秦始皇之暴虐來突顯徐偃王之仁義，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實為發端，亦為韓愈所獨創，影響所及，北宋仁宗時文人胡宿〈徐偃王廟〉同樣採取此說：「誦誦耳孫慶，惟烈在仁柔」。⁶⁶

〈開河記〉寫至徐偃王，亦隨即提及秦始皇，可見其並列對比的暗示，並說秦

紀》，頁 870。

⁶⁴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2，頁 105-107。

⁶⁵ 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17，頁 1865-1867。

⁶⁶ 宋·胡宿：《文恭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6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3，頁 540。

始皇築長城造成百姓死傷無數：「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唐五代傳奇集》，頁 2675），似乎可見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之影響。迄至南宋劉克莊〈徐偃王廟〉詩：「仁暴由來各異施，秦徐至竟孰雄雌？君看驪岫今無墓，得似柯山尚有祠。」⁶⁷同樣並列徐偃王及秦始皇，也同樣著眼於仁義與暴虐之對比，且「君看驪岫今無墓，得似柯山尚有祠」兩句，更明顯承襲自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之「秦鬼久饑，徐有廟存」一語。可見，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內論徐偃王的對比寫法及批評觀點，對宋代文壇之影響不小⁶⁸，〈開河記〉並列對比徐偃王及秦始皇，近於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而非過去典籍單敘徐偃王，更可能作於宋代。

再綜觀〈開河記〉，麻叔謀開河先在睢陽掘至司馬華元墓，夢宋襄公，下一段則在彭城掘出偃王墓，夢徐偃王，同於上述寫徐偃王、次述秦始皇的並列寫法，這種並列宋襄公、徐偃王的寫法，〈開河記〉並非特出獨創；北宋張耒〈子產論〉曾並論兩人之失敗：「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就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⁶⁹蘇軾亦論述二人與仁義之關係：「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⁷⁰可見〈開河記〉並列宋襄公及徐偃王，或出於北宋文人慣用的寫法，此種情節安排構謀只可能作於宋代。總而言之，〈開河記〉或參考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及北宋文人史論所擅用的並列書寫模式，設計先單純並列、後則並列對比之寫法，造成宋襄公／徐偃王、徐偃王／秦始皇之情節次序。

由造作典故的手法來看，〈開河記〉稱：「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

⁶⁷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10，頁 613。

⁶⁸ 韓愈自中唐至北宋文壇的影響力稍有變遷，北宋文壇對韓愈推崇備至，頌揚力道已非中晚唐、五代可以比擬。詳見趙修霽：《〈雲仙散錄〉之撰作時代：由書中所錄之唐人詩文才華故實析論》，《東吳中文學報》34（2017.11），頁 44-45。

⁶⁹ 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36，頁 641-642。

⁷⁰ 宋·蘇軾撰，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鐸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樂毅論》（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卷 4，頁 333。

命之為卞渠，因名其府署為卞渠上源傳舍也。」（《唐五代傳奇集》，頁 2669）不過，揆諸《宋史·汴河志上》記載，隋時稱「通濟渠」，唐時改稱「廣濟渠」，宋時才稱此漕溝為「汴渠」：「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為汴首受黃河之口」⁷¹，因此〈開河記〉說隋煬帝命人開鑿由大梁至廣陵之運河，「命之為卞渠」，不合於史載。而〈開河記〉敘述煬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唐五代傳奇集》，頁 2669），從而有了「汴」州，又與典籍不合：前代早有「汴河」之名，不必待至隋煬帝；至於「汴州」之名，北周時亦有，反而隋煬帝時廢此州名，至唐肅宗時才恢復「汴州」之名，後梁開平元年又升「汴州」為開封府，唯後唐略有變化，至宋代「汴州」與開封多同指一地。⁷²有趣的是，漢代河南滎陽縣西南有卞水，《漢書·地理志》作「卞」，豫州有「卞」縣，《後漢書》始作汴渠，兩相比較，可知指的是同一條河⁷³；可見河名以水為偏旁並非理所當然，背後實有自「卞」至「汴」的歷史變革。

同樣地，《詩經·采薇》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⁷⁴可見自先秦即有「楊柳」之名，但〈開河記〉稱隋煬帝栽垂柳於汴渠兩堤，並「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唐五代傳奇集》，頁 2676），意謂柳之所以後世名為「楊柳」，是因為煬帝

⁷¹ 元·脫脫等撰：《宋史·汴河志上》，卷 93，頁 2316。

⁷² 如北周宣帝時，「仲文軍至汴州東」，見唐·李延壽：《北史·于仲文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3，頁 853。唐·魏徵等撰：《隋書·地理志中》卷 30，〈滎陽郡〉條下有「浚儀縣」，注曰：「東魏置梁州、陳留郡，後齊廢開封郡入，後周改曰汴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通濟渠、蔡水。」頁 835。「天寶元年，改汴州為陳留郡。乾元元年，復為汴州」。後晉·劉昫：《舊唐書·地理志一》，卷 38，頁 1433。「梁開平元年，梁祖初開國，升汴州為開封府，建名東京……後唐復降為汴州……晉天福中，復升為東京……漢、周並因之。」宋·薛居正：《舊五代史·郡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50，頁 2012-2013。

⁷³ 如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8 上〈滎陽〉條，下有：「卞水、馮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涕，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頁 1555。「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其下李賢等人注曰：「汴渠即蕘蕘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又曰：「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分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明帝本紀》卷 2，頁 114；頁 116。

⁷⁴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詩經正義·采薇》，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卷 9，頁 334-2。

將隋朝國姓「楊」賜予垂柳；然而，「楊柳」之名，自古即有，何來賜姓之說？可知，〈開河記〉掌握了自「卞」至「汴」的歷史變革，再將此附會於與汴河關係密切的隋煬帝身上，宣稱是隋煬帝所改；又藉隋煬帝開汴渠，且汴堤植柳之事，附會「楊柳」典故。這種以歷史衍異手法造作典故之情況，與〈韓湘子〉、〈王謝〉、〈梅妃傳〉一類北宋傳奇附會歷史、詩詞典故，從而創造新的故實的寫法頗為類似⁷⁵，實為北宋傳奇標新立異而杜撰典故之風氣的展現。

程毅中認為，收錄於《青瑣高議》之〈海山記〉應為宋人所作，而「〈開河記〉有可能是《青瑣高議》的佚文」，以此說明〈開河記〉為宋人所作，雖然並未詳細論述，但根據上文所述〈開河記〉三項特點：「睢陽一段各項線索：時間、地點、人物、文意及典故」；「以並列書寫模式設計宋襄公／徐偃王、徐偃王／秦始皇情節次序」；「造作汴渠及楊柳典故」，可以歸納〈開河記〉運用了「歷史衍異」的手法進行寫作，且應承襲自北宋傳奇無疑。再輔以上文所論「睢陽有王氣出」、「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豈可偶為遊逸，致使掘穿王氣」等線索，更可以明確〈開河記〉當作於南宋高宗初期，一則隱喻宋徽宗好遊逸致使北宋亡國，一則期許南宋高宗可以開創「萬世之業」。

四、設詞指事的〈迷樓記〉

〈前言〉曾經提及章培恒舉出陳與義作於建炎四年的〈虞美人邢子友會上〉：「超然堂上閑賓主。不受人間暑。冰盤圍坐此州無」⁷⁶用〈迷樓記〉藉望冰盤以消暑之典故：「入夏，帝煩燥，日引飲幾百盃而渴不止。……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⁷⁷而建炎年間兵荒馬亂，〈迷樓記〉若作於

⁷⁵ 趙修霈：《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90-91、94；趙修霈：《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頁 266-269。

⁷⁶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387。

⁷⁷ 〈迷樓記〉情節、文字俱依李劍國《唐五代傳奇集》據上海涵芬樓排印張宗祥校明鈔本《說郛》卷

南宋初，陳與義未必能得而一見，因此章氏認為〈迷樓記〉應作於北宋。⁷⁸這是由其他人用〈迷樓記〉典故，推測其著作時間，本節將通過〈迷樓記〉內容、寫作手法，比勘〈迷樓記〉與其他北宋傳奇敷衍故實的手法，以補充說明〈迷樓記〉之撰作時代。

首先，〈迷樓記〉以「迷樓」為名，即以介紹隋煬帝迷樓開始小說。〈迷樓記〉內隋煬帝自豪於迷樓的精巧：「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闌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並由此說出「迷樓」的命名理由：「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不過，除了迷樓外，〈迷樓記〉緊接著又敘述了隋煬帝的「御童女車」、「任意車」及「鑑屏」：「御童女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於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可知此車便於隋煬帝御未經人事、害羞放不開的處女；「任意車」則需要有人在車外牽引才能前行，「可以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迷樓記〉內隋煬帝親自為此車命名，並說明命名理由：「任其意以自樂」；至於「鑑屏」，則是隋煬帝原本令畫工畫「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掛於閣中，以此助興，後來得烏銅磨為鑑再做成的屏風，隋煬帝將此鑑屏環於迷樓，「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隋煬帝如獲至寶：「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唐五代傳奇集》，頁 2684-2685）

由〈迷樓記〉開頭一連細數四項供隋煬帝玩樂的器物，可知〈迷樓記〉雖以「迷樓」為名，但絕不拘泥於「迷樓」一物，而是通過一一細數這些供隋煬帝玩樂的器物，環環相扣，層層加深隋煬帝愛好女色的形象，而此一重點其實早在〈迷樓記〉開篇首句：「煬帝晚年，尤深迷女色」清楚提出；而隋煬帝自白：「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亦可看出〈迷樓記〉形塑隋煬帝的重點在其追求快意享樂，並不泥於「迷樓」一事。此外，雖然隋煬帝建迷樓藏美女「費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好色荒唐且耗費極大，但「御童女車」、「任意車」及「鑑屏」皆較迷樓更顯荒淫。（《唐五代傳奇集》，頁

32 〈迷樓記〉校錄，後皆出於此。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2684-2688。

⁷⁸ 章培恆：《〈大業拾遺記〉、〈梅妃傳〉等五篇傳奇的寫作時代》，頁 108。

2684) 這些關於隋煬帝荒淫的聯想，並非空穴來風，史傳記載：大業 8 年，隋煬帝「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隋書·煬帝紀下》，卷 4，頁 83)，不僅要在民間訪美女，還要童女，甚至每歲貢之，可知〈迷樓記〉通過自史傳記載之隋煬帝好色荒淫形象，設想「迷樓」、「御童女車」、「任意車」、「鑑屏」等故實，並運用「設詞指事」的手法形塑小說內的隋煬帝形象：藉由接二連三敷衍隋煬帝好色之細節，呈現史傳簡略提及的隋煬帝沉迷女色一事。

其次，〈迷樓記〉的最後一段，敘述煬帝認為自家世祚衰亡是天命註定，非人力所能抗衡：

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為之耶？」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啟之也，天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唐五代傳奇集》，頁 2687-2688)

隋煬帝聽見民間傳唱的歌謠，知道不得民心，卻不思改變，反而認為「天啟之也」，是上天預示楊家國祚不久、李家將興；對於近侍不知煬帝為何悲傷，煬帝竟然也說：「休問，它日自知也。」頗有李唐興起指日可待之意。然而，這些反應對於一般臣子百姓而言，可說是無從著力，只能徒然傷悲；但置於一國之君隋煬帝的身上，就極不合適，以一朝天子的身分卻不思盡全力挽回險惡的局勢，反而對當前事態束手無策，只能裝聾作啞、旁觀不理，充份表現出隋煬帝無能至極的面貌。而這種寫法，與北宋傳奇〈玄宗遺錄〉非常類似：一用樂音為兆、二以卜卦得見、三由奏章確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唐玄宗早已掌握了安祿山反叛的徵兆，但仍坐視不理，任其發生，唯一的準備即是自己西逃，造成唐玄宗昏懦無能的人物形象。⁷⁹

⁷⁹ 趙修霈：《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頁 72-77。

當唐太宗焚毀迷樓後，〈迷樓記〉總結說：「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所謂前謠指的是迷樓宮人靜夜所唱「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之歌，暗指李家將興，而前詩則是隋煬帝所作詩：「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變紅輝」，預料迷樓將遭火焚；由迷樓宮人所唱的民謠、隋煬帝所作的詩都已一一應驗，卻非得出隋煬帝所謂的「天啟之」，而是「世代興亡，非偶然也」（《唐五代傳奇集》，頁 2687-2688），隋代亡國並非偶然，而是其來有自，也就是說，不是上天要亡隋煬帝，實是煬帝先沉迷女色、後不思振作所造成。這種論斷迥異於唐末羅隱〈迷樓賦〉認為隋煬帝乃為人所迷的觀點：

將使乎旁不通於日月，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右，左有鄭、衛。君王欲問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於是相秉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隋煬帝迷於樓乎？迷於人乎？若迷於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煬帝非迷於樓，而人迷煬帝於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⁸⁰

兩相對比，明顯不同，〈迷樓賦〉將亡國之罪歸於隋煬帝被佞臣、美女所迷，隋煬帝雖然有錯，錯在不該讓佞臣、美女包圍自己；但真正的問題癥結在佞臣、美女身上。至於〈迷樓記〉，則將責任全部置於隋煬帝一人身上，表達隋煬帝是自作自受、必須獨自承擔的歷史觀點；這樣的觀點亦不直接出以議論，而是利用宮人唱民間歌謠、隋煬帝作詩來「設詞指事」，表達「世代興亡，非偶然也」的看法。

〈迷樓記〉這種觀點，又十分近似於北宋傳奇〈楊太真外傳〉、〈驪山記〉、〈溫泉記〉、〈玄宗遺錄〉、〈梅妃傳〉等，或運用「禍階」論斷，或通過「尤物」、「玩物」的楊貴妃想像，或藉「根本沒有」的梅妃，落實唐玄宗才是安史之亂罪魁禍首，必須為唐代國勢衰敗負責之人⁸¹，既不同於唐代陳鴻〈長恨歌傳〉「尤物惑人」之說⁸²，

⁸⁰ 雍文華校輯：《羅隱集·讒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27-228。

⁸¹ 趙修霈：《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第二至四章，頁 21-124。

⁸² 唐·陳鴻：〈長恨歌傳〉提出「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認為具誘人美貌的女子，是導致禍亂的階梯。收入汪辟疆輯校：《唐人傳奇小說》（臺北：世界書局，2000），頁 117。

也。不同於《舊唐書·玄宗本紀》末劉昫等史臣之看法⁸³：唐玄宗是受到小人蒙蔽迷惑才導致安史之亂，故真正的過錯是在誘惑蒙蔽君主之人，而非唐玄宗。職是以觀，中唐至五代評論安史之亂，與羅隱〈迷樓賦〉評論隋煬帝亡國的觀點角度頗為接近，皆認為君主為身邊小人迷惑而導致亂國、亡國；而〈迷樓記〉論斷歷史不同於唐人，近於北宋敷衍李楊故事之傳奇〈楊太真外傳〉、〈驪山記〉、〈溫泉記〉、〈玄宗遺錄〉、〈梅妃傳〉的觀點。

第三，〈迷樓記〉除了開始敘述隋煬帝的「迷樓」、「御童女車」、「任意車」、「鑑屏」及最後的歷史論斷外，中間兩段先有王義上奏勸諫、後則列舉八首侯夫人詩。王義上奏：

臣聞精氣為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於其中，自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一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以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淨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唐五代傳奇集》，頁 2685-2686）

這段話一方面通過王義勸諫之說，側面證明隋煬帝怠忽荒政、荒淫無度，一方面又透過隋煬帝之口，表達清心寡慾的生活令人悒悒不快，正面彰顯煬帝重視逸樂、女色。再者，此段「王義上奏」呼應了〈海山記〉的「王義上書」，〈海山記〉內隋煬帝在天下將亂前，對王義三番兩次地說：「汝何故省言而不告吾也？」「子何不早教我？」（《唐五代傳奇集》，頁 2648-2649）而〈迷樓記〉即安排了王義主動上奏、及早勸諫隋煬帝之情節，沒想到隋煬帝仍是執迷不悟，兩相呼應，一則可以凸顯〈迷樓記〉的歷史論斷：隋煬帝並非為人所迷，而是自取滅亡；一則又可以具體回應〈海

⁸³ 「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已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壤，雖大必虧；木有蠹虫，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後晉·劉昫：《舊唐書·玄宗本紀下》，卷 9，頁 236-237。

山記》「王義上書」說煬帝剛愎自用、不納諫諍，甚至，由〈迷樓記〉對〈海山記〉的回應，可以推測，〈迷樓記〉寫作時間應晚於〈海山記〉。

另外，〈迷樓記〉記載隋煬帝後宮有無數宮女，因此不得進御者亦夥，其中，侯夫人有色有才卻不得進御，最後自經於棟下，死時手臂繫有錦囊，中有侯夫人所作八首詩，巧合的是，〈海山記〉敘述隋煬帝遊西苑湖海所作湖上曲〈望江南〉詞亦是八首，可見，〈迷樓記〉侯夫人八首詩對應〈海山記〉隋煬帝八闕詞，這種列舉詩文內容的寫法同樣呼應〈海山記〉。

總而言之，〈迷樓記〉運用「設詞指事」之手法，設想「迷樓」、「御童女車」、「任意車」、「鑑屏」、侯夫人自殺等故實，證明隋煬帝沉迷女色；利用迷樓宮人唱民間歌謠、隋煬帝作詩、王義上奏等，說明隋煬帝不知振作，具體表達隋煬帝亡國是自作自受的歷史觀點。再藉由王義上奏、侯夫人八詩等內容隱然連結〈海山記〉，可以推測〈迷樓記〉應稍晚於〈海山記〉，且〈迷樓記〉篇幅較〈海山記〉短小許多，或為補充史傳約略有載、〈海山記〉未曾敘述的隋煬帝沉迷女色享樂之事。

結語

〈海山記〉通過敘述「隋煬帝生長、即位、死亡」、「羅列西苑鳥獸草木」、「災祥、夢兆」、「王義上書」，暗藏對隋煬帝之歷史批判及歷史觀點：本不當為帝卻能因母親獨孤皇后的偏愛而即位；大業 10 年以後，叛亂四起，勢焰薰天，隋煬帝如「坐烈焰中」；不納諫諍、遊逸享樂；過分奢靡、盡情縱欲。這些歷史議論並非直接進行，而是「以述代論」：通過講述隋煬帝故事，暗藏深刻之歷史批判。

歸納〈開河記〉之三項特點：「睢陽一段各項線索：時間、地點、人物、文意及典故」；「以並列書寫模式設計宋襄公 / 徐偃王、徐偃王 / 秦始皇情節次序」；「造作汴渠及楊柳典故」，可知〈開河記〉不同於〈海山記〉，完全不依據隋煬帝史事書寫，反而利用其他相關故實層層孳衍，以「歷史衍異」的寫法從而創作出連環扣合、密

織成網的隋煬帝故事。

〈迷樓記〉不論是設想「迷樓」、「御童女車」、「任意車」、「鑑屏」等故實；或利用迷樓宮人唱民間歌謠、隋煬帝作詩，表達隋煬帝亡國是自作自受的歷史觀點；或藉由王義上奏、侯夫人八詩等內容隱然連結〈海山記〉，皆不直接議論批判隋煬帝，而採用「設詞指事」的手法，藉由敷衍隋煬帝故實，自然呈現史傳僅簡略評議的隋煬帝形象。

進一步來說，〈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三篇細節相互映襯：〈開河記〉運用〈海山記〉內批評隋煬帝本不當為帝卻能因母親偏愛而即位的故事，暗指宋徽宗之所以即位為帝，也是因為其兄哲宗無子而崩、向太后極力堅持所立；〈迷樓記〉在王義上奏、侯夫人八詩上，又與〈海山記〉相呼應。就宏觀的角度來看，以〈海山記〉為首，依時間次序敘述隋煬帝自生至死，為人物傳記的基本寫法，而〈開河記〉、〈迷樓記〉各抓住隋煬帝生平事蹟之其中一脈線索，敷衍成文，至於只關注開鑿運河、沉迷女色兩事，則又與史傳論斷有關：

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飢相食，邑落為墟，上不之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為娛樂。（《隋書·煬帝紀下》，卷4，頁94-95）

由《隋書·煬帝紀下》論贊可知，若不論隋煬帝興兵征伐、好大喜功之事，最讓百姓苦不堪言的應是為開鑿運河、營建宮室所造成的勞役繁重，而開鑿運河、三下揚州及營建宮室、淫逸取樂皆為滿足煬帝驕奢無度的欲望。簡言之，〈海山記〉時代最早，書寫隋煬帝完整的人物傳記；接著，〈開河記〉、〈迷樓記〉分別敷衍開鑿運河及淫逸取樂之事。因此，「隋煬帝三記」雖未必出於一人之手，但隨著「三記」的相繼完成，隋煬帝形象益加完整且豐滿。⁸⁴

⁸⁴ 夏秀麗：〈《大業拾遺記》與《隋煬三記》淺析〉，頁44-47。夏氏稱「隋煬三記」的內容多有相合映襯之處、行文筆法亦十分相似，但並未說明如何相合映襯，殊為可惜。

總之，由〈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之內容結構、歷史觀點、寫作手法來看，「隋煬帝三記」敷衍故實的手法應屬北宋傳奇，且以〈海山記〉時間最早，至遲應在哲宗元祐間；〈迷樓記〉稍晚於〈海山記〉，但應完成於南宋之前，最遲作於徽宗時；〈開河記〉最晚，約在南宋高宗初期。職是以觀，「隋煬帝三記」雖撰作時代略有先後，但應先後創作於北宋哲宗初期至南宋高宗初期的四十年間。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戰國·韓非著，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詩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 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柳宗元撰，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宋·車若水：《腳氣集》，收入新興書局輯：《筆記小說大觀·四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1989。
- 宋·胡宿：《文恭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58-6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宋·黃庶：《伐檀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

- * 宋·劉斧撰，施林良校點：《青瑣高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蘇軾撰，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 李劍國輯校：《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 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 汪辟疆輯校：《唐人傳奇小說》，臺北：世界書局，2000。
-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2010。
- 雍文華校輯：《羅隱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二、近人論著

李菁：〈唐傳奇文《煬帝開河記》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0（2012.3），頁 32-38。

*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

李劍國：《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李劍國：〈《大業拾遺記》等五篇傳奇寫作時代的再討論〉，《文學遺產》1（2009.1），頁 21-28。

夏秀麗：〈《大業拾遺記》與《隋煬三記》淺析〉，《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7：5（2010.10），頁 44-47。

徐俊：《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名號探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章培恆：〈《大業拾遺記》、《梅妃傳》等五篇傳奇的寫作時代〉，《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5：1（2008.1），頁 106-110。

郭紹林：〈舊題唐代無名氏小說《海山記》著作朝代及相關問題辨正〉，《洛陽師專

學報》17：1（1998.2），頁 57-62。

*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

趙修霈：《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趙修霈：《深覆典雅：北宋敷衍故實傳奇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

*趙修霈：〈《雲仙散錄》之撰作時代：由書中所錄之唐人詩文才華故實析論〉，《東吳中文學報》34（2017.11），頁 29-53。

齊淑慧：〈唐末傳奇文《煬帝開河記》研究〉，《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2014.2），頁 415-416。

劉莉：〈古代文學領域中隋煬帝故事研究綜述〉，《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5（2012.10），頁 105-108。

*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

蕭相愷：《宋元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薛洪勳：《傳奇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日〕河野真人：〈「隋煬帝艷史」に於ける「隋遺錄」「海山記」「開河記」「迷樓記」の襲用について〉，《中國文學論集》28（1999.12），頁 51-6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o Hsiu Pay, *Shen Fu Dian Ya: Bei Song Fu Yan Gu Shi Chuan Qi Xi Lun* [An Analysis of the Legends Using Allusion to Classic Saying in North Song Dynasty] (Taipei: Student Book, 2016).
- Chao Hsiu Pay, “The Writing Times of *Yun Xian San Lu*: An Analysis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Anecdotes Pertaining to the Tang Poets and Talents in the Book” in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34 (Nov. 2017), pp. 29-54.
- Cheng Yi Zhong, *Song Yuan Xiao Shuo Yan Jiu* [A Study of Novels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1998).
- Li Jian Guo, *Tang Wu Dai Zhi Guai Chuan Qi Xu Lu* [An Introduction of Weird Novels and Legend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 Jian Guo, *Song Dai Chuan Qi Ji* [An Anthologies of Legends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Li Jian Guo, *Tang Wu Dai Chuan Qi Ji* [An Anthologies of Legend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 [Song] Liu Fu, *Qing Suo Gao Yi* [Chinese Classic Bizarre Stories in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Lu Xun, *Tang Song Chuan Qi Ji* [An Anthologies of Legend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inan: Shandong Qilu Press, 1997).
- Lu Xun, *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ue*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s]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Tang] Wei Zheng, *Sui Shu* [Book of Su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